

世经述评

□ 陈希蒙

德国高福利模式难以为继

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奥尔斯纳布吕克市基民盟州级党代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德国当前的福利国家制度在财政上已难以为继。他表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福利国家，已经无法再用我们经济的产出予以维持。”此言论引发德国社会广泛关注，被视为德国高福利模式可能迎来改革的信号。

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其社会福利体系被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典范。自19世纪俾斯麦时代引入社会保险制度以来，德国逐步构建了涵盖医疗、养老、失业救济、教育等领域的全面福利体系。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德国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30%以上。这一体系不仅保障了社会公平，也为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和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疫情暴发之后，德国福利体系的财政可持续性面临多重挑战。2025年新总理默克尔上任后，面对预算赤字、人口老龄化、工业竞争力下降等结构性问题，福利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今，默克尔提出福利改革的主张，试图在经济低迷和政治分化的背景下，重新平衡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德国高福利模式难以为继的根源，可归结为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一是经济增速放缓与预算压力。德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间经历了多重冲击。2022年至2023年的能源危机、全球供应链中断以及俄乌冲突导致的出口下滑，重创了德国以制造业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

2024年德国GDP下降0.2%，自2003年以来首次连续两年负增长。2025年预算赤字进一步扩大，联邦政府预计财政缺口将达到数百亿欧元。

与此同时，德国福利支出的刚性需求持续上升。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24年德国社会救济支出增长14.8%，总净支出达到202亿欧元。其中，56.5%的支出归属养老金及残疾人基本保障，该部分支出金额较去年增长13.3%。默克尔在讲话中指出，当前经济产出已难以支撑如此高昂的福利成本，财政赤字的扩大迫使政府必须重新审视支出结构。

二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德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是福利危机的重要推手。自1991年以来，德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大幅增加，从1200万人增至2023年的1889万人，占总人口的22%。老龄化导致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快速增长，而劳动力人口减少使得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萎缩。2024年总共有1270亿欧元的税款被用于填补养老金亏空，占到了联邦财政支出的三分之



一。根据

预测，到2050年，养老金缺口还将翻番。此外，东西德统一后，福利体系向东德扩展增加了财政负担，但东德经济至今未能完全融入全国经济体系，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压力。

三是全球竞争与产业转型。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德国高度依赖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等传统产业。然而，近年来国际竞争加剧，电动车转型和数字化浪潮使德国企业面临技术升级压力。咨询公司安永最新分析报告显示，德国汽车行业过去1年净减岗位约5.15万个，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工业部门。默克尔明确表示，福利改革需与支持企业发展同步进行，排除对中型企业增税的可能性，以保护就业和经济增长。

四是移民与社会融合的挑战。移民政策也是带给福利体系压力的重要因素。德国近年来接收了大量难民和移民，2024年净移民人数约为43万人。默克尔在讲话中强调将继续限制移民流入，以减轻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然而，移民同时也是劳动力补充的重要来源，限制移民可能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影响经济活力。

默克尔对福利改革的相关表态在国内引发广泛争议。一方面，经济学家和企业界普遍支持改革，认为高福利已成为“福利陷阱”，抑制了投资和创新。根据德国工商大会调查，60%的企业认为高税收和高福利

2025年联邦政府预计财政缺口将达到数百亿欧元

2024年德国社会救济支出增长14.8%

德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大幅增加

自1991年以来 增至 1200万人 1889万人 占总人口22%

默克尔在维护联盟稳定的同时，推动实质性变革，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

其三，公众支持的获取。改革的成功离不开民意支持。默克尔政府需通过透明沟通和渐进式调整，缓解公众对福利削减的担忧。

其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波动、地缘政治风险以及能源转型的成本，都可能影响改革的实施节奏和效果。

默克尔关于高福利模式难以为继的表态，揭开了德国社会经济体系深层次矛盾的盖子。在经济低迷、人口老龄化和全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福利改革成为不可回避的议题。然而，改革的推进需在社会公平、财政可持续性和政治稳定之间找到平衡点。默克尔政府能否成功应对这一挑战，不仅关乎德国的未来，也可能为其他高福利国家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未来一段时期，德国的改革方案和实施效果将备受全球瞩目。

目前来看，德国福利制改革即使能够推行，也将面临多重挑战。

其一，平衡公平与效率。削减福利需避免加剧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在通胀压力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已显著上升。改革可能优先调整高收入群体的福利待遇，或引入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其二，联合政府的内部妥协。联盟党与社民党的分歧可能会影响改革进程。

美关税风险冲击土耳其汽车产业

“推升成本”“现金流承压”“出口疲软”……记者近期走访土耳其汽车产业供应链多环节，感受到该国汽车产业因美国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焦虑。业内人士警告，持续上升的供应链成本和通胀压力，将削弱土耳其汽车产业竞争力，加剧中长期风险。

汽车行业连续多年是土耳其第一大出口行业，去年出口额同比增长6.3%至372亿美元。目前，美国对土耳其汽车及零部件维持25%的关税。土耳其对美出口汽车不多，但美国关税政策变化对全球整车厂订单部署具有“信号放大”作用，给土耳其汽车产业带来三重风险。

首先，成本多层传导加重利润侵蚀。梅塞汽车零部件公司是土耳其一家老牌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是众多品牌授权经销商和出口商之一，其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服务点主要承担仓储与物流管理、销售与市场拓展等业务。现场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关税在全球范围内推高了成本，挤压供应商利润，而产品经由美国进入其他整车体系时，成本还可能被进一步传导。

过去一年土耳其本币里拉对美元持续贬值，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最终传导至民生领域，侵蚀本国消费者购买力，进一步拖累土耳其车市行情。伊斯坦布尔一家主营本土品牌汽车的经销商门店负责人艾谢·耶尔马兹说，最近几个月已经感受到潜在买家购车更为谨慎，未来门店销

许万虎

王昊

最后，汽车行业或被迫转向国内市场，加剧产能过剩挑战。为规避关税，一些海外进口商已出现转向墨西哥、东欧等市场的苗头。伊斯坦布尔商会警告，土耳其一些中小供应商未来或退出全球价值链并转向内需市场，而有限的内需难以消化过剩产能，行业潜在的供需失衡风险将加剧。

“虽然去年出口再创新高，但（土耳其）汽车业产能利用率仍偏低。”埃罗尔杜说，如果不能尽快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土耳其业未来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将进一步受损。

土耳其业界认为，未来几年将是该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期。在美关税政策压力下，如果土耳其不能推动实现绿色发展和智能化转型，汽车产业将面临更严峻的中长期挑战。

滥施钢铝关税救不了美国制造业

王立

近日，美国政府宣布扩大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50%关税的范围，将数百种衍生产品纳入加征关税清单。美国商务部在当天晚间发布的《联邦公报》表示，工业与安全局已将407个产品编码加入《美国协调关税表》，这些产品将因所含钢铁和铝成分而被加征额外关税。《联邦公报》称，这些产品中非钢铁和铝的部分，将适用美国对特定国家商品所征收的关税税率。扩大的关税清单已于8月18日正式生效。截至目前，美实际关税税率已达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以来最高水平，构成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负面冲击。

关税武器化是把双刃剑，它虽能带来短期政治经济收益，却往往伴随着长期战略损耗。纵观美国对外贸易史，历次关税战效果均适得其反。自美国联邦体制确立以来，共有5位总统在3个经济衰退周期中动用过关税工具对外加征高额关税，但这些政策实验形成的经济创伤至今仍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留有疤痕。现在全球化产业链复杂程度已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滥用关税工具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破坏效能正以几何级数增长。

如今，美国正企图再次通过关税手段构建逆全球化经贸规则，将自身制度成本转嫁给全球贸易伙伴。其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早已超越正常经贸政策范畴，正演变为维系其全球经济垄断体系的战略工具。

美国对贸易伙伴滥施关税手段被其定义为“对等关税”原则，但本质上是基于自利的保护主义规则，以“美国



8月12日，一名顾客在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一个杂货店进行采购。（新华社发）

而且，从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审视美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可以看出，其基于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设计产生了双重悖论：第一，美国对外征收的巨额关税中，绝大部分成本通过产业链传导最终将由美国企业承担；第二，部分美国跨国企业虽然实施了重构全球供应链策略，但产能转移仍主要集聚于东盟区域，并形成了对原有供应链的次级依赖。实际上，其构建的所谓“对等关税”体系诱发产业链逐级衰减效应，正在侵蚀美国制造业根基。除此之外，美国在现实层面将遭受多重反噬效应，包括消费者持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跨国企业被迫降低效率全球布局等。

近日

美国宣布扩大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50%关税范围，将数百种衍生产品纳入加征关税清单。美国商务部发布《联邦公报》公告，工业与安全局已将407个产品编码新增至《美国协调关税表》

扩大关税清单已于8月18日生效。截至目前，美实际关税税率已达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以来最高水平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滥施关税手段不仅不能缩减贸易逆差或保护产业链，还会造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结构性失衡。当美国挥舞关税大棒、频频打击全球贸易伙伴甚至传统盟友之际，国际贸易格局也随之发生深刻转变。当前美国采取的关税战策略非但不能使其重现上世纪的经济辉煌，反而可能加速催化其全球经贸主导地位的削弱。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大洋洲研究所研究员）

日前，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全球贸易更新报告9月版，报告指出，由于全球紧张局势和经济挑战，各国外交政策在调整贸易政策时往往引发政策不确定性，进而导致贸易波动加剧，对于依赖贸易的经济体构成风险，并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报告指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较于关税破坏性更大，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可以适应成本上升，但难以应对不可预测的政策变化。小企业和贫困国家因为缺乏应对不可预测贸易环境的能力，脆弱性更加突出。报告指出，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变化会波及上下游，扰乱供应商、制造商和最终市场。应对政策不确定性，企业会采取一些短期措施，包括加速运输、建立库存等，但这些措施会带来额外成本。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突出。报告将美国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案例，指出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全球贸易有突出影响。报告称，美近年来频繁调整贸易政策，例如对华加征关税、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等，有关措施导致美政策方向和最终实施实践难以预测，这种不确定性给企业和贸易伙伴带来了巨大挑战，使其难以进行长期规划和投资。报告称，美国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单边行动，例如加征关税、实施制裁等，而较少通过寻求多边机制解决贸易问题。这种单边行动加剧了全球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报复性措施。贸发会议评估，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扰乱了全球价值链，影响了上下游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依赖美国价值链的经济体面临更大风险，其生产和出口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影响尤其严重，这些经济体缺乏应对能力，更容易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并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受阻。

报告呼吁各国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合作提升全球贸易韧性与稳定性，缓解和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各国政府在决策制定上应基于明确的经济分析和数据支持，充分说明政策变化的理由和预期影响，增强政策可预测性，帮助企业和投资者更有信心地进行长期规划和投资。在新的贸易措施实施前，各国政府应该提前通知，以便企业和贸易伙伴有时间进行咨询和调整。报告还提出，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应推动各国加强政策协调，避免采取报复性措施，并建立应对不确定性的框架。报告尤其呼吁各国遵守并加强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中的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以减少政策突变的风险，通过规则约束，减少单边行为，为贸易提供更稳定的环境。此外，报告鼓励各国和企业拓展出口市场，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增强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缓解因某一市场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企业应着力提升供应链灵活性，包括建立备用供应商、增加库存和采用多种运输方式等，以便在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能够快速调整策略，减少运营中断和损失。

报告强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风险因素。各国政府、企业和国际机构需要共同努力，通过透明、协调和多元化措施减少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增强贸易韧性，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梁桐

桐